

聚焦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此次“全国十大”评选竞争激烈前所未见

历史的脉络与枝叶，因考古不断丰富。3月31日揭晓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掀起一股“考古热”。此次评选有哪些特点和亮点？为何“考古热”能持续吸引眼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许多入选项目
都是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的

王巍说，本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竞争极为激烈，前所未见。在入围的20个项目中，精彩项目扎堆出现，让评选委员们难以取舍。众多考古项目发掘的实物资料，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科学的学术支撑。

从评选结果看，入选项目时代分布比较均衡，从距今20万年前的旧石器



王巍

时代考古，持续到明代考古成果。从地域分布上看，入选项目既包括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也包括边疆地区。

近年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学术课

题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我们从哪里来？何以中国？考古正用实证解决疑问。

王巍介绍，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有许多是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比如，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均是围绕文明起源重大学术课题开展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

“考古热”频登热搜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此外，王巍说，作为此次唯一斩获“双子星”的省份，四川的两个考古项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因其遗物丰富性、遗址本身的神秘性，以及多学科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科学发掘方法，不仅

完成了一次颇受欢迎的考古科普，更是现代考古学的一项范例。

发现稻城皮洛遗址的国际意义不可忽视。考古发现让人们看到，人类在13万年前就已登上了青藏高原，其中发现的遗物遗迹，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非常独特。

在王巍看来，近年来，“考古热”频繁登上热搜，体现着一种社会的进步。“包括民众的关注度、媒体的宣传度、考古学家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增强，共同形成了‘考古热’。”他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当民众对考古的关注不再是简单的猎奇，而是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民族的历史、了解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这就是考古的意义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

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四川考古进入全新时代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结果揭晓，四川的稻城皮洛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成为本届唯一的“双子星”，此外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发掘的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也榜上有名。

“2021年度是双丰收，对于整个四川文物考古圈而言，都是一个喜庆的年份。考古人用切切实实的贡献，向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献礼。”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出炉后，中国考古学会成员，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心潮澎湃。

“距今13万年前，人类就已登上青藏高原，同时创造了非常具有特色的石器时



霍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代文化，皮洛遗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个考古发现。”霍巍说，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至名归。

在霍巍看来，皮洛遗址发掘面积非常大，目前仅发掘了几个点位。他相信，未来皮洛遗址可以为全世界的考古

人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人选，霍巍说，三星堆辉煌灿烂的文化内涵早已深入人心，强烈的社会关注为三星堆入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此次考古使用了全新的科学技术，将文物保护与现场发掘紧密结合，中国考古学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最新面貌，也通过三星堆考古展现给世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为何四川考古人参与的发掘项目能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占据三席？在霍巍看来，四川考古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实施四川考古规划，建立考古队伍，健全研究机构，同时加强川内文博考古单位之间的合作等举措关系密切。

霍巍说，四川考古取得的成果，是几代考古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换来的，这也是四川进入中国考古第一方阵的重要原因。

对于四川考古的未来，霍巍信心十足，“如今，‘三驾马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并驾齐驱，四川考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庞大的冰山露出一角，期待未来还有更多发现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迎来四川考古的黄金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戴竺芯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旧石器考古就像“盲人摸象” 摸得越全认知越多

看上去略显荒芜的稻城皮洛遗址，为何能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高星。

在高星看来，皮洛遗址能获得评委的一致认可并入选，取决于其毋庸置疑的独特学术重要性和社会意义。无论是遗址巨大的分布面积，令人叹为观止的完整地层序列，还是出土遗物的丰富、独特和组合特征，都令业内的学者惊叹和欣喜。他说，皮洛遗址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历史篇章，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



高星

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对于远古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旧石器时代占了人类历史上99%的历史进程，是人类最为基干的部分。”高星说，这一时期的遗物遗迹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孕育了后期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元素，因此其重要性不可忽视，皮洛遗址的发现正印证着它的重要性。

对于皮洛遗址接下来的发掘和研究，高星希望能更加深化和细化，包括

遗址年代的进一步测定、目前缺失材料的新发现，以及目前已提取样本的深入研究。

“皮洛遗址目前发掘和调查的面积仍然有限，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和发掘。”高星说，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历史时期时代遗址不同，由于当时的人类处在狩猎、采集，不断迁徙移动的状态，因此很难存在集中的遗物遗迹和相关记录，其文化遗存常散布在一些区域，遗址范围或许更大。“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得到认知越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

重走古蜀文明发展路 纪录片《古蜀瑰宝》第二集播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洁 戴竺芯)3月31日晚，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第二集《迁徙·融合》亮相央视纪录频道，四川卫视当晚9点15分播出。纪录片以古蜀文明遗址的最新发掘及研究成果为主线，摄制组尝试重走古蜀文明的发展之路，勾勒出距今5100年到2600年间古蜀文明的形

成脉络。

古蜀文明如何发展而来？考古发现，古蜀人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周期性迁居。

距今4600年，营盘山遗址被废弃，先民们离开生活了700年的家乡，一路南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黄明和同事花了6年时间，终于揭晓了营盘山先民迁徙的谜题。

在距今6000-4000年间，地球气候剧变，北半球气温骤降，曾经辉煌的人类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消亡。同时期，营盘山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4700年前，成都平原河网密布，水

患频发，气候条件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这一次气候灾变，却恰恰改变了这里的物候条件。源自黄河上游与源自长江中下游的两支古人类，分别沿岷江、长江进入四川盆地，并在成都平原这片全新的沃土上相遇，他们在这里驻扎、修城、繁衍，由此揭开了古蜀人大规模改造四川的序幕。